

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建新 邓一鸣 吴家森 等 编著

Shehuizhuyi
Xinnongcun Jianshe
Tansuo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探索

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Shen Zhongyi
Xinwengongcun Jianshe
Ta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建新 邓一鸣 吴家森 等 编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 李建新, 邓一鸣, 吴家森等编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81081 - 789 - 9

I. 社... II. ①李... ②邓... ③吴... III. 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1001 号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李建新 邓一鸣 吴家森 等编著

◇策划组稿: 刘苏华

◇责任编辑: 曾剑俊 曹爱莲

◇责任校对: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7 千字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789 - 9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1)
一、历代中国农村建设概况	(1)
二、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概况	(10)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建设	(26)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40)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步探索	(46)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目标	(55)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55)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77)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法治建设	(98)
第三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目标	(118)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民脱贫致富	(118)
二、新农村建设与经济发展目标	(136)
第四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态目标	(182)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182)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居住环境	(202)
三、实施乡村清洁工程, 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22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第五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目标	(229)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229)
二、新农村建设与提高农民素质	(255)
三、新农村建设与村规民约建设	(273)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	(285)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重点	(286)
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	(296)
三、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310)
参考文献	(323)
后记	(325)



第一章 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农村是先进生产力的孕育地，农村是社会变革的主战场。历史经验和农村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妥善处理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足安康的坚实基础。在我国当前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历史潮流的果断抉择。

一、历代中国农村建设概况

1. 古代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与影响

(1) 农村的农民成为历史文明与动荡的双重源头

我国的农村，在世代更替的过程中，时有兴衰。最突出的是农民用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把一年分为 12 个月，称为物候历法；古人为了治水建造了一个个奇迹般的水利工程；古代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不断革新农具，使用牛力、水力耕种、灌溉；此外，古人还培育五谷、驯养六畜，创造了传统的育种技术。古代中国农业的这四大发明，都是农民智慧的结晶，是农村孕育的成果。由此，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农业的领先地位。盛唐时，我国年人均拥有粮食 628 公斤，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比今天人均拥有粮食还高出近一倍。13 世纪，曾有一波斯人说过，中国的“大都小邑，富厚莫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无一国可与中国相比拟”。

农村和农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还来源于无数次反抗起义，动摇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朝廷，显示了无比的革命性力量。不管各个时期起义背景多么错综复杂，起义队伍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农村，起义的主战场是农村。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的演变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纵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无一不是由天灾及人祸、民不聊生所致。在国外，农民起义大多是为自由而战，而中国农民都是为生存而战。农民之所以起义，多因受尽苦难煎熬，确实无路可走；又被封建制度和朝廷所逼，不得不铤而走险。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一支支起义队伍都充满反抗暴政的精神。那些高举着“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义旗，多有开官仓、解民于倒悬之义行的起义队伍，无不体现着农民善良、质朴的本质。

当然，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都使得社会动荡、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更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使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农民领袖脱下布衣，换来的依然是龙袍，继承的还是前朝君王的专制统治。尽管开朝之初，天下太平，然而，另一轮苦难，往往又在悄悄地积聚。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民起义是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但同时又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又一层悲壮的色彩。正如元曲所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2) 农村长期承担着重农和重税两面政策的压力

战国时期著名法家代表商鞅，最早把农业定为“本业”，而其他行业都称之为“末业”。他宣扬“事本”而“禁末”，进而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理论。他一方面主张“仓廩虽满，不

偷于农”，强调粮食多了也不能放松农业生产，并制定几十项鼓励甚至强制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例和措施；另一方面主张增加税收，要使农民“家不积粟”。商鞅既重农，又重税，“野无荒草”，“民不逃粟”。商鞅的重农和重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他的重税论有着明显的负面作用。秦始皇采纳了他的主张，赋役繁苛，驱民急迫，结果“二世而亡”。

西汉以后，每个朝代都着力推行重农政策，君王们都深知“民之大事在农”，起初都能轻徭薄赋，与民养息，尔后总是横征暴敛。虽有几次大的改革，但正如清代思想家黄宗羲所说，搞一次税费改革，农村负担就加重一次，进而留下“积累莫返之害”。汉代农民交口赋（人口税）、算赋（成年税）和献费（献给皇帝的费）。三国曹魏改征田赋和户调。唐代先实行以丁男为本的租庸调制，后实行一年两次交纳地税和户税的“两税法”。明代把田赋、杂税和徭役合并，一律征收银两，实行“一条鞭法”。清代把按人头征收的“丁银”摊到田赋上去，实行“摊丁入亩”。按说，几次改革都是为了扩大纳税面，让有地产、有钱财的人多纳税。但是，由于吏治腐败，纲纪松弛，负担最后都转嫁到农民头上。

在重农和重税两面政策的挤压下，农村虽然生产出很多农产品，但在朝廷垄断农桑流通渠道、实行抑商政策的条件下，没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要么品尝谷贱伤农的苦果，要么体会被无偿掠夺的滋味。所以，春秋时代，农村就有“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的不满，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慨。到了明清时代，统治者强征硬派，更是习以为常。明末学者任源祥一语道破其征收税费的目的：“巧立一切之法，以愚天下之耳目。”

（3）农民受尽着制农和愚农的两面手法的危害

从管制人民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制民史。有重赋必有苛政，重赋苛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历史的周期性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中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商鞅把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认为“民强国弱，民弱国强”，要想国家富强，必须最大限度地削弱人民的力量。商鞅认为，一个君主，要想控制天下、战胜敌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制服自己境内平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秦始皇采纳商鞅的意见，一方面用严刑酷律制裁对秦政不满的人民；一方面设置郡县，建立吏治，实行户籍—地籍—赋税三位一体的系统管制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一个专制制度的头。

通观中国历史，封建集权制政府对农民大都实行严厉的管制。在经济制度上，把封建的土地、户口、赋税制度捆在一起运行。历史上被称为“黄册”的户籍制度和“鱼鳞册”的地籍制度，成为迄今为止最浩繁最真实的征收赋税依据。封建政府通过对农民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控制，直接实现对生产者的控制；通过对生产者强制性征收赋役，达到削弱人民力量的目的，进而巩固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政治统治，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在政治制度上，通过严格的户口登记，实行严酷的“连坐”制度，加强对基层百姓的约束；如果百姓造反，毫不犹豫实行镇压。

从教化人民的角度看，愚民政策古已有之，而且影响深远。较早提出“愚民”观点的是老庄和管仲。老子曾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极力反对开发民智，要求从精神上、物质上杜绝一切能够激发民智和引起争端的措施。庄子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有“绝对弃智”，社会才能安宁。管子也认为“君明、相信、五官肃、士廉、农愚、商工愿，则上下相体，而外内别也”。

愚民主张最明确、最系统的，是商鞅和韩非子。商鞅说：

“有国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的根本手段则是使民“朴”，也就是愚民。商鞅强调“圣人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在他看来：“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他认为一旦平民愚昧，不崇尚学问，就会专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从事农业。商鞅说“民愚则易治也”。

从儒家的主张看，明明白白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愚民主义的特点是有有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因而更有欺骗性。儒家要求统治者“修身”、“立诚”，施行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内圣外王”境界。另一方面，提出一套“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要求人民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做安分守己的顺民。西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对统治思想重新调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等人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愚民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比秦代的更佳。所不同的是，秦始皇的愚民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愚民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宋代以后，理学盛行，老百姓便只有被愚弄的份了。朱熹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意愿便是天理。百姓只能甘心为奴，至多只能渴望有一个行“仁政”的君主。明显的例子就是把当权者视为父母爹娘。众所周知，古代的老百姓对地方官都称为“父母官”，对清廉官吏的称赞都是“爱民如子”。农民世代代都得顺从专制统治。

2. 近现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振兴农村的探索

(1) 近现代中国农村的破产

到近代，由于封建势力的长期统治、帝国主义的侵入、兵连祸结，农村经济多次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地方村舍被焚，大批农民背井离乡，田园荒废，茫茫千里，鸡犬不闻。1935年，据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个省1001个县调查，全家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村的农户就有 192 万户，占总农户的 4.8%。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村庄和集镇也随之衰落。农村中，一面是地主豪绅陈谷落仓，囤积居奇；一面是广大农民饥肠辘辘，饿殍载道。遇有灾年，境况更惨。农民颗粒无存，啼饥号寒，卖儿卖女。有的相率入山，采掘草根充饥。绥远甚至发生过“易子而食”或活人吃死尸的事件，景象惨绝人寰。由于破产，许多地方田地荒芜，农民纷纷弃家逃荒，流落外乡。1928 年至 1930 年，陕西一省外逃的农民即达 723 万人之众。1931 年，全国四分之三的县发生大水灾，有的地方水深 9 尺，泡塌房屋占原有房屋总数的 45%，农民流离失所者多达 40%。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从民国初年开始的 20 多年中，发生大小战争 400 余次，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历史上曾经相当繁荣的许多小城镇，由于农村的破产、战争的摧残，处于严重衰退之中，有的化为废墟。直到解放前夕，广大农民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 “乡村建设”运动

①乡村建设运动概要

面临农村的破产，一批文人、学士发起振兴农村的运动。最早提出倡导的是河北省定县的米迪刚、米鉴三。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他们就提出了振兴农村的动议。1904 年，米鉴三留日回国后，在他的家乡——定县翟城村——成立了“爱国宣讲会”，劝用国货，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办了阅报所、图书馆，以“灌输村人知识，养成优美乡风”；1905 年，成立了“改良风俗会”，提倡男不满 20 不娶、女不满 16 不嫁，禁止丧事念经、妇女裹足；还成立了“睦邻会”，以联络村人感情，吉凶相向，灾难相助；办了“勤俭储蓄会”，以养成村民耐劳淳朴之风；并提倡大力凿井，平整道路，开发农业。米氏的试验，在社会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有的赞扬，有的批评，也有的认为不合时宜。批评者指出：“米氏的试验趋于复古，他的思想渊源是周易，他的理论

第一章 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根据是大学，他的理想人物是虞舜。”由于指责颇多，瞿城村的试验中断下来。

之后，一些受西方教育和社会思潮影响的文人、学士也大造舆论，推动乡村运动，并各有独立的宗旨，主要分三派：

一是以教育家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1927年，陶行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创设乡村建设学村。以学校为中心，附设有联村卫生会、商店、医院、救火会、武术会、石印厂、民众学校。其方针是：寓教于生活，实行“教、学、做合一”。这种试验，历时三年，无果而终。1932年，陶行知又组织了乡村改造社，提出：“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结力量，保护大众的性命。”他组织乡间农民接受生产、科学、识字、民教、生育、军事六大训练，企图通过组织训练民众，改造乡村。这一努力也没有成功。

二是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他认为，中国农村民智未开，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只有提高农民的文化，才能使他们对于改造乡村有彻底的认识和信仰。1924年，晏阳初在保定道的22个县推行平民教育，并于1926年至1936年在定县创办了平民教育试验室。他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的“贫、愚、弱、私”四大毛病，试行文艺、生计、生产和卫生四大教育，以增进农民的“智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晏氏的主张，是一些好的愿景，但解决不了当时农民饥寒交迫这一社会经济问题。

三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提出：“中国为乡村国家，应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以乡村为本，以农业引发工业，而繁荣都市。”并提出：“做农人是我们的口号，下农村是我们的呐喊。”1931年6月，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任院长，并以邹平县为试验区，欲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组织乡村社会。梁漱溟的主张，在当时外患日迫的情况下，也未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实现。

除以上三派外，还有一些小的团体也在研究乡村建设问题。这种团体，大小合计，总数达 1005 个。其中，多数仅限于空喊口号，并无实际行动。在这个期间，研究社会问题的一批学者提出：中国之今日，需要社会调查，一个镇、一个村，就是一个小社会，只有分析社会现象构成之要素，才能提出指导性的改革方案，以唤起民众解决自身相关的社会问题。随之，乡村社会学也活跃起来，许多社会学家发表了调查文章。费孝通教授也写了《乡村经济》、《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等著名论著。他以乡村社区为对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宏观的研究。

②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

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各种出版物也如汗牛充栋，大量涌现。例如，北平有《乡土杂志》、《乡村问题周刊》，山东有《乡村建设》，湖北有《乡村建设月刊》，四川有《乡村建设季刊》，浙江有《乡村建设通讯》，等等。许多文章认为：过去中国的农村，并不注重建设，或委以自然，或循于旧制，因而长期没落，无昭苏之象，因此，振兴农村，要有建设的纲要。这些文章提出了种种主张，摘其要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集镇。认为集镇是农村中物资交流和金融流通的大本营，工商业是农民离不开的伴侣，茶楼、酒店是农民交际的中心。振兴农村，不可忽视集镇这个环节。应当以“人才下乡，游资下乡，事业在乡”的方式，发展农村中的工商业和金融事业，俾使乡村和都市两者均衡发展。

第二，兴办农田水利，改良耕作技术，发展合作事业，活跃农村金融，推进农业生产，以达到土无旷荒、民无游荡、人无不学、事无不举的目标。

第三，平整道路。组织村落之间的交通网，并按户出工，利

第一章 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用农闲，分段铺垫，征工修建。路旁要有出水口，用石修治，求其高下相宜，使水不致冲坏路基。

第四，修建公厕，疏浚井渠，加强卫生管理，普及卫生知识，以改善环境。

第五，提倡植树，保护森林。农田为民生之本，蓄树为国政所先。人民植树，理为天责，所费无几，收效无穷，应大力提倡。

第六，乡镇要加以整理，使其划一。村庄大小，应以方便生产为条件。一般距下地的距离，以不超过半小时为宜。半小时，步行是5里，马行是10里。因此，理想的半径应在5里以上、10里以下。户数，平原地区以200户为有利；集镇以2000人为低限、1万人为高限比较适宜。

第七，改造农村住宅，要有切实而合理的设计，尽可能利用当地材料。住房地势宜高，居高临下，则排水方便。住宅周围，应植以花木，力求静雅。还可选择有条件的农户，建设示范性的住宅。

第八，保护风景、名胜，尊重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并请有希望的人士出面主持。

第九，造就建设人才，重视理论与经验的交融，以发挥教育与建设的效力。

这些主张和议论，虽有一定道理和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农村处于严重破产的情况下，都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我国历史上曾喧闹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到1937年也就无声无息了。当时的报纸、杂志，对这一段乡村建设运动，有所评述，指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

一是脱离社会实际。当时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争民主、争自由、争解放，是历史的主流，而乡村建设的倡导者，却回避现实的社会矛盾，故归于失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

二是参与和发展乡村建设运动的人员主张不一，各有所求。有的人抱着一种好的愿望，想振兴农村，为农民办一些好事；但也有的是投机分子，聚沙而下，赶时髦，喊口号，想乘机混个“乡官”，以鱼肉人民；还有的人，自恃过高，甚至把自己看成是农民的“救世主”，目空一切，傲气十足，但到乡下转了一转，才知乡下人对自己毫无感激的表示，也就灰心了。

三是盲目照搬外国。在他们看来，照搬外国的方剂就可以医治中国农村之疾病。殊不知，乡村是一个复杂的、活的、有机的社会实体。各国国情不同，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因而在事实面前碰了壁。

二、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概况

1.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20 世纪的前半叶，是我国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社会矛盾非常激化的一个历史时期。在干戈纷竞、兵难寇祸的年代里，我国的乡村建设遭受到很大的破坏。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乡村建设，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特点。

在 20 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下，根据地不可能从事大量的乡村建设。但是，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各个革命根据地还是利用一些战斗的空隙时间，帮助群众恢复了许多因为战争而破坏的住宅；同时，为了适应当时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需要，也修建和改造了数量可观的公共建筑，如学校、会堂等。

“七七”事变后，在日寇沦陷区的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更加悲惨，村镇面貌衰败不堪。面对日寇的侵略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的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组织人民，恢复

第一章 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历程

和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解放区迅速扩大。在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获得解放的农民，一方面支援前线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组织生产互助组，举办合作社，兴修水利，修桥筑路，兴办学校，发展通讯，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进一步发展乡村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建设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大半河山，广大农民更加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东北三省的农民，生活尤其悲惨。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居住条件也十分恶劣。东北农村中汉族、满族、朝鲜族、鄂伦春族的农民大都住在茅草顶、土坯墙的小破屋里。多数农家是三代人同睡一条炕，生活状况达到了极为低劣的程度。华北、华东等地的广大农村，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疮痍满目，遍地废墟。有的地区在日寇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的涂炭下，成了无人区。

面对敌人连续发动的疯狂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的军民，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疯狂的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在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家园。陕北是我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这个地区，是旧中国经济上最贫困、文化上最落后的地区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的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7年7月全国抗战开始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边区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普选，建立了乡、区、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民主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各方面减轻人民的负担，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社，开展合作运动；发动群众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生产。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在根据地生产逐步发展、经济日益繁荣的条件下，出现了一